

外研社学术文库·英美文学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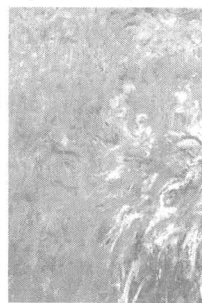
Editor: John Richetti

Associate Editors: John Bender
Deirdre David
Michael Seidel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外研社学术文库·英美文学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

Editor: John Richetti

Associate Editors: John Bender
Deirdre David
Michael Seidel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 01-2004-1539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edited by John Richetti

Copyright © 1994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is English reprint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sale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 =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 (英)里凯蒂 (Richetti, J.) 主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8
(英美文学文库)
ISBN 978-7-5600-8529-6

I. 哥… II. 里… III. 小说史—英国—英文 IV. 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5760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负责: 姚虹

责任编辑: 唐辉

封面设计: 牛茜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大学印刷厂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68.5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00-8529-6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5290001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钱 青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宁	王守仁	王逢振	区 钨
毛思慧	石 坚	申 丹	宁一中
吕大年	朱 刚	刘建华	刘象愚
刘意青	阮 炜	苏耕欣	杜瑞清
李公昭	李文俊	杨仁敬	肖明翰
吴 冰	何其莘	张子清	张在新
张 冲	张伯香	张 剑	张 耘
陆建德	金 莉	周小仪	胡家峦
侯毅凌	姚乃强	殷企平	郭棲庆
陶 浩	黄 梅	戚 宁	董衡巽
韩敏中	程锡麟	虞建华	

General Prefac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global culture is the arrival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FLTRP is to be congratulated for its imagination and foresight in making these crucial texts available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literature throughout China. There is arguably no greater force in producing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s than the transmission of literary traditions—the great heritage of narrative, lyric, and prose forms that give cultures their distinctive character.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stand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se transmissions. It is the body of writing that reflects on what a literature has meant to a culture. It investigates the moral, political, and experiential dimensions of literary traditions, linking form to content, literature to history, the sensuous love of literature to analytic understan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these important texts will greatly help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become acquainted with recent criticism and major critical theories and movements.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series will mak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ry education of China, increasing literacy in new fields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extraordinarily timely venture, at a time when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y in a global contex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professionals, and beyond that, for a general readership that seek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W. J. T. Mitchell

Gaylord Donnelley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English and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Editor, Critical Inquiry

出版说明

近年来，许多大专院校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了英美文学课程，市场上也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原版英美文学经典著作，它们基本上满足了高校对课堂阅读教材的需要。但是，英美文学教学中仍然严重缺少原版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工具书等重要参考书，以至于许多学生写论文时收集资料成为一大难题，专业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业务水平的提高因此受到限制，在知识更新及学术研究上也难以与国际接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尤为如此。

据此，外研社组织了全国17所著名高校或研究院的44名英美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经过仔细斟酌，决定引进一批与教学需要相适应，有学术价值，在国外最常用且被国际公认为优秀的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工具书。这是一套开放型的系列图书，以原版加中文序言的形式分批出版。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定可缓解国内大专院校中英美文学参考书匮乏的现象，同时，通过这种途径，可以有意识地引进国际知名学者的代表作，这无疑会推动和提高我国在英美文学领域的研究水平。

钱 青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这本由约翰·里凯蒂教授主编的单卷本《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是首批4种“哥伦比亚文学史”之一，收有论文40篇，作者都是一时之选。该书史论兼备，展示了上世纪末英美学术界在该领域的最新批评特点和价值趋向，对我国英文系的教师和学生是极有帮助的。书名中的“British”一词需要作一些解释。人们往往用“the English novel”指称“英国小说”，这只要查核一下很多书名即可得到验证。这种用法是不够准确的。“English”是“England”（英格兰）的形容词，怎么可以把英格兰等同于英国呢？也许是出于一种习以为常的民族主义倾向，很多英格兰人偏爱这种修辞学上以局部代替全部的举隅法。1707年，早已控制了威尔士的英格兰与苏格兰共同通过合并法，两个王国合而为一，称“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从此，国家大事的议决都在伦敦进行，爱丁堡作为苏格兰政治中心的地位彻底丧失。不能否认，就人口、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而言，英格兰在英国都占优势，英格兰人也就习惯于在该用“British”的地方用“English”。由于这一原因，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北爱尔兰人说到国籍时会说自己是“British”，一般不喜欢被称作“English”。苏格兰议会在上世纪末恢复，表明英国国内非英格兰人的民族意识渐渐高涨。本书英文书名既反映了美国人的习惯，也反映了现今人文学术研究中民族平等的思想。这是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

（一）

本书的优点之一是没有僵化的时代分期。不少文学史都会把20世纪上半叶称为现代主义的时代，然而随着我们对该时期认识的深入，我们发现从来没有一条“现代主义”的统一战线，即使詹姆斯·乔伊斯和维吉尼亚·吴尔夫都在创作中使用了所谓的“意识流手法”，他们所描写的意识之流在品质上并无共同之处，正如《尤利西斯》中的莫莉和吴尔夫笔下的拉姆齐夫人、黛洛维夫人断然相异。时代之间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剑桥大学第一任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教授克·斯·刘易斯曾说，“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这样的分野并不可靠，文学史上没有地理学概念上的海岸线和分水岭，历史不会行走如飞，有所变化也是难以察觉的。我们的生活包罗万象、延绵不绝，没有固定的形体，也没有缝隙和接榫，人为划分的时期往往造成混乱，而“现代主义时代”和“后现代主义时代”之类的概念只会歪曲文学作品的意义。在20世纪上半叶，真正操“现代主义”官话的先锋派为数寥寥，绝大多数作家我行我素，讲着他们自己形式多样的方言。例如，“意

识流手法”常被视为现代派写作的标记，但是一度几乎跟庞德和艾略特齐名的作家兼画家温德姆·刘易斯却在他的《讽刺与小说》（1930）中提出与吴尔夫对立的观点：对潜意识的发掘并不会带来对人物的独特性的认识，因为它所揭示的无非是未加分辨的感情和本能，这方面人人相同；假如艺术家一味流连于心理的黑暗角落，那么他／她就背叛了自己的天职。刘易斯说，要把普世一致的原材料形塑出个性来，外观和行动是不可或缺的（见本书第880页）。顺便说一下，刘易斯本人还是一位很有特色的先锋派小说家。

同样，标准、正宗的“后现代作家”是否存在也不得而知。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将“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完全对立起来，他的概括性描述在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很有名气，但是那些所谓的标记性特点不大经得起推敲。在这本英国小说史中，萨缪尔·贝克特作为“后现代派”来讨论的。说来也巧，十二三年前，我奉命写一篇论一位英国“后现代派”小说家的文章，想来想去没有合适的人选，只好把爱尔兰裔的贝克特搬出来。^①我当时就觉得，贝克特长期在法国生活，他的后期小说用法文写成，对象是精选的法国读者。从他的写作轨迹来看，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只是某些“现代主义”信条的翻版。贝克特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就投入乔伊斯门下追求一种彻底消解意识、自我和写作的手法，这一手法几乎贯穿他的全部作品，凝固为一种特有的风格。他参与发布所谓“垂直诗”的宣言，想提倡一种与世隔绝的语言，并以此来解构意识并消除语言和人类文化遗产“强加于”个人心智的辨识异同的能力。我始终认为，贝克特后期的小说是主题先行的文字实验，它们几乎没有读者，只有少得可怜的教授和博士学位候选人才会为了论文的需要而去图书馆查阅。在20世纪的英国小说史上，很多作家的成就不在贝克特之下，但是他们没有“后现代派”之类醒目的名号来作自己的招牌。我十分荣幸地注意到，英美学者并不都相信文学艺术不断前进发展，越“后”越好，站在所谓的时代浪尖上的，也许只是泡沫。在沙卡文·伯科维奇教授主编的《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中文版于2005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里有一章题目是“反思后现代派”，作者温迪·斯坦纳对所谓“以约翰·巴斯和托马斯·品钦为代表的后现代派时代”是否存在表示怀疑。概言之，如果确有后现代派，那它也只是百草园中的一景而已。

这本《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不拘泥于僵化的时代分期，故而有的文章可以较大的时间跨度，论及的作者也较多。“从吉卜林到拉什迪：从帝国主义到后殖民主义”就是一例。这一题目是有一定代表意义的。它提示，本书中不少论文大致上由一位或几位作家带出一个主／话题，如“萨克雷和绅士的意识形态”、“迪

^① 见《自由虚空的心灵——萨缪尔·贝克特的小说创作》一文，载陆建德主编的《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四卷本《英国小说研究》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斯累里、盖斯凯尔和英格兰的状况”。其他论文是作家或某一类别小说（如感伤小说和哥特式小说）的专论。

（二）

自从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1957）问世后，英国小说的起源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本书主编约翰·里凯蒂的《理查森之前的通俗小说：1700年至1739年间的叙事模式》（1969，1992）就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瓦特所采用的社会学方法又与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相结合，成为上世纪末英国小说起源研究的一大特色。迈克尔·麦基恩的《英国小说的源起：1600年至1740年》（1987）和J.保罗·亨特的《小说之前》（1990）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也常被学者们谈及。对源头的兴趣进而又大大促进了18世纪英国小说的研究。（J.保罗·亨特的“小说和社会／文化史”一文高屋建瓴地概括了这一领域新的理论前提和研究动向，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剑桥文学指南”系列中的约翰·里凯蒂编《十八世纪英国小说》。）F.R.利维斯的博士论文《从英格兰报业的发源与早期发展看新闻业与文学之关系》（1924）至今未出版，颇为可惜。我们不可忘记，很多英国作家曾是报人，菲尔丁是在以《闲谈者》和《旁观者》为先导的新闻学校里掌握小说家的技巧的。尤其应该强调的是，随着女权批评的兴盛，女性读者、作者对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巨大贡献得到普遍认可。人们在追溯英国小说的起源时发现，17世纪末，英国社会开始消费为数惊人的“罗曼司”。这些“罗曼司”往往是由生活上自由不羁的女性所创作的情色小说，它们是英国小说的重要源头。罗丝·拜勒斯特还在《引诱的形式：1684年至1740年的女性情色小说》（1992）一书中赋予这些作品经典的意义。本书“前言”后第一篇文章泛论小说的起源，第二篇“笛福与早期叙事”确定了笛福作为现代小说开山鼻祖的地位。紧随其后的文章讨论的就是王政复辟时期至18世纪中叶的情色小说。显然，有些学者要把“罗曼司”提升为英国小说的直接发祥地或者它的发展史上的主线。（我以为，很难用一种极其纯粹的本质来界定并限定小说。长江起源于唐古拉山脚下的江源水系，逶迤东行的路上千溪百流汇入它的主流，坚持说它发源于某一条河是意义不大的。）我国的英国文学专业师生对当时的“罗曼司”和情色小说所知相对较少，补补课也属必要。出于一种可以理解的谨慎，我们编的文学史对这些女作家很少提及。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第一版）中有关英国文学的词条里，出生于18世纪的女作家只有简·奥斯汀一位。换句话说，奥斯汀之前的作者全是男性，可见当时我国学界对文学史撰写过程中的父权观念还缺乏认识。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例如黄梅论18世纪英国小说的著作《推敲“自

我》》(三联, 2003) 的第一章就是“贝恩和复辟时代的遗产”。这位阿芙拉·贝恩(1640—1689)是最早的英国女作家之一, 生活阅历异常丰富, 甚至做过查理二世手下的间谍, 吴尔夫对她十分佩服, 称她具有“平民的幽默、活力和胆量”。黄梅着重分析的是贝恩的小说《奥鲁诺克》, 该书讲述的是非洲某国王子被卖作奴隶的故事。但在《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里, 研究者更关心的是贝恩、德拉里维埃·曼利和伊丽莎·海伍德等女作家的情色小说如何表现性角色的颠倒, 如何以女性的“凝视”(gaze, 理解为知识/权力的专制掌控) 取代男权中心的“凝视”。18世纪初是以往英国文学史上所谓的“奥古斯都时代”, 一个以和谐以及蒲柏式的对句著称的社会竟然流行这类极具颠覆性的读物, 这恰恰说明简单的时代分期会产生误导作用。

本书卷末附有百位英国小说家小传, 出生于奥斯汀之前的女作家竟达17位之多, 其中有像贝恩、玛丽亚·埃奇沃思、弗朗西丝·伯尼(“范妮”)和女权运动先驱玛丽·伍尔斯特克拉夫特这样有名的人物。有的作家入选比较勉强, 似乎是“政治立场正确”(PC)的标准所致。这说明近二十年来, 文学地图已经彻底重新绘制。本书有好几篇文章是专论女性作家的, 对女性文学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阅外研社“英美文学文库”所收的伊莱恩·肖瓦爾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 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作家》。也有几位出色的女作家的名字未见提及, 如艾丽斯·默多克和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1916—2000)。后者几乎不为我国读者所知晓, 评论界对她的《船上人家》(1979年布克奖)和《蓝花》(1995)等小说评价很高。

英国女性小说家的成就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她们的地位应该突出, 但是要把这当成一项事业, 也可能矫枉过正。例如我们发现深受奥斯汀喜爱的约翰逊博士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卷末的人物小传里, 约翰逊的《拉塞拉斯》以及“人类欲望皆虚妄”的认识也就被边缘化了。清教徒班扬也被排斥在名单之外。要讨论英国小说的起源, 班扬和他的宗教寓言是不可不提的。杰出的英国史学家克里斯多弗·希尔甚至把班扬视为一个时代的缩影^①。曾有批评家认为, 班扬的语言质朴有力, 性格描写贴近生活, 他的作品能振奋人的精神, 唤醒一个民族的宗教记忆。也许现在越来越世俗化的时代尊崇的不是所谓的“清教徒的良心”。在《天路历程》里, 基督徒背负的包袱装满了自己的罪恶, 他手持《圣经》, 一边读, 一边颤抖流泪并发问: “我该怎么办?”这样的场景和《罪人受恩记》、《恶人先生的生平和死亡》之类的书名在一个偏爱“愉悦”和“欲望”的年代不仅乏味, 而且令人生厌。可是以重视历史细节和“物质基础”著称的研究者也应该承认, 《天

^① 详见希爾著《騷亂的、鬧派別的、人民: 約翰·班揚和他的教會》(A turbulent, seditious, and factious people: John Bunyan and his church, 1628—1688),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9年。

路历程》一版再版（甚至不断被盗版），长期以来是英国普通人家必备的3本书之一（另两本是钦定本《圣经》和弥尔顿的《失乐园》）。班扬本人数次因宗教信仰入狱，可见宗教背景的知识对理解英国文学史至关重要。可是宗教因素在这本文学史里却淡出了，大概是因为学界前辈这方面已经谈得太多。我感到欣慰的是，由我国学者吴景荣和刘意青主编的《英国十八世纪文学史》（外研社，2000）里，紧随《概论》一章的是《约翰·班扬和宗教寓言》。

（三）

本书出版于1994年，那是一个“终结”的时代：“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之类的标题不时闯入人们的眼帘。人们自然会想到小说是不是也已经或正在“终结”。其实对这“狼来了”式的警报大家不必惊慌失措。上世纪20年代初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问世后，它的批评者认为它不能算是一部小说。为乔伊斯辩护的T.S.艾略特也在他影响极大的文章《尤利西斯：秩序和神话》中说，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已经成为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形式，它早在福楼拜和亨利·詹姆斯的手里就寿终正寝了。可是当今的文学史家无一例外地把《尤利西斯》归入小说一类，福楼拜和詹姆斯也远不像艾略特以为的那样保守，他们所代表的传统并没有因《尤利西斯》的畅销而消亡（本书未收专论詹姆斯的文章是一大遗憾）。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实验小说来势汹汹，“小说之死”仿佛即刻就要实现，那些要叫死唱衰小说的人暗中企盼“心想事成”（英文里叫“self-fulfilling prophecy”），从而登上“小说终结者”的宝座。然而相隔数十年，人们惊喜地发现，气数已尽、被时间淘汰的不是常人所说的小说，而是那些以极端见长的作品。急于跟传统彻底决裂的B.S.约翰逊未能在这本英国小说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是很好的例证。诚然，不少英国作家都希望尝试小说叙事新手法，但是他们并不拒绝与历史和传统达成一定的妥协。创造从来不是发生在历史真空里的行为，它总与以往的文学血脉相通。种种对小说这一文类的或温和或偏激的挑战无非丰富了小说，加深了人们对它的认识。一些来自法国的时髦概念（如巴尔特的“可读”与“可写”）流行一阵后又归于沉寂，罗伯-格里耶、萨罗特和比托尔的“新小说”、“反小说”和“元小说”的大旗也有点萎靡不振，失去了往昔的号召力。法国式实验小说的影响不致决定英吉利海峡北岸小说的发展。现在人们问得较多的反而是：法国小说家怎么变得不会讲故事了？不能否认，在英国小说史上，欧陆小说（或小说的先驱）确实给英国作家提供了灵感甚至学习的楷模，但在很多场合下，英国作家把它们视为有用的参照，有时则是抵制的对象（详见本书《回避自然主义》一文）。当今大多数英国作家和普通读者并不十分关心理论的喧嚣或所谓认识论上

的革命，他们不大习惯某些法国同行（包括贝克特）的过激姿态，更愿意透过亨利·詹姆斯所说的“小说之屋”的窗户观察、感受并描绘窗外的世界，讲述虚实相生的故事，探讨个人和社群共同体的关系。他们对社会历史抱有浓厚兴趣，擅长利用包括日记、书信和传记在内的各类史料，以想象力丰富的形式品评历史事件和人物。

创新的手法并不是一条单行道，作家不会一踏上创新之路就变成自以为是、只知勇猛突进的单骑英雄。例如，约翰·巴恩斯在80年代创作了形式别致新颖的《福楼拜的鹦鹉》和《一部十章半的世界史》，然而他在1992年发表了用所谓19世纪“全知全能”叙述方式写成的小说《豪猪》，又根据东欧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背景讲起故事来。显然，“小说之死”或小说的“非小说化”、“非故事化”离我们还极其遥远。巴恩斯的这段话充分表达了当代英国小说家的自信：

好久以来，人们周期性地宣告上帝的死亡和小说的死亡。这都是危言耸听。由于上帝是人们虚构故事的冲动所创造出来的最早的、最好的艺术形象，我愿把赌注押在小说上——不论它是何种变异的文本——我相信，小说的寿命甚至会超过上帝。（瞿世镜译文）

将小说的源头定位于人类虚构上帝之时，这是小说家比学者高明的地方。

当今英国小说创作的局面应该说是繁荣的。20世纪是大英帝国解体的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地纷纷独立，但是英国利用它的灵活政策保持了一个“英联邦”的名义，女王仍然是英联邦的首脑。但是疆域的缩小并不意味着语言文化的衰落，英国文学甚至还继承了一笔帝国的遗产：一大批来自原殖民地或异域、自幼接受英式教育、只会用英语进行创作的作家。这些作家在英国定居，以英语读者为理想读者，他们的作品就像往昔爱尔兰作家（如伯克、王尔德、萧伯纳）的作品一样，完全被纳入英国文学的轨道。这笔遗产无比丰厚，它使当代英国小说改变了本来面目，变得与美国小说有某种相似之处，例如种族关系和移民生活成为重要的内容。英国《卫报》（2005年1月31日）称这类作家为“帝国的子女”，可谓十分贴切。《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问世以来，又有不少来自英国联邦国家的移民子女为当代英国小说注入新鲜血液。2005年初以《小岛》一书获奥兰治奖和惠特布莱德奖的安德烈娅·利维出生在英国，父母是牙买加移民。类似利维的作者还不少，如《砖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作者莫妮卡·阿里。

(四)

最后我想提一提主编里凯蒂为本书写的《前言》。这是“为小说一辩”式的文章。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曾大谈“语言学的转向”，小说一度被理解为不关外物的语言游戏，或成了手术台上活体解剖的对象，听任代表科学技术的柳叶刀施展技巧。但是里凯蒂心目中的英国小说是“一部生活的闪光之书”(D.H.劳伦斯语)，它为一种广义上的道德关怀所照亮，同时又具有巴赫金式的多声部。他赞赏英国著名学者、批评家弗兰克·克莫德的观点：“即使是在当今的状况下，小说仍然可能是伦理探究的最佳工具。”确实，威廉·戈尔丁以寓言的形式对恶的揭示，安杰拉·卡特基于女权思想对传统童话故事改写，伊恩·麦克尤恩绝望中冷峻而典雅的风格以及他笔下决无天真可言的童稚生活（详见本书迈克尔·伍德文），所有这一切都属伦理探究的范畴。小说家的伦理探究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永远不会抽象和枯燥。简·奥斯汀说过，在小说里，心智最伟大的力量得以显现，“有关人性最透彻深刻的思想，对人性各种形态最精妙的描状，最生动丰富的机智和幽默，通过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传达。”尽管现当代一些英国作家身上有一种使维吉尼亚·吴尔夫感到惶惑不安的“亵渎神圣的卑琐”，我还是衷心希望这本《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成功地成为奥斯汀的名言作注。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

英美文学文库

导 读

Introduction

IN a memorable and ringing affirmation, D. H. Lawrence called the novel “the one bright book of life.” For Lawrence the novel was much more than a literary genre; it was a means to intensely vital knowledge, far superior to science or philosophy or religion. In place of their abstract and partial views of life, the novel offered the “changing rainbow of our living relationships.” But at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Lawrence was celebrating the power of the novel to give its readers the full and authentic feel of human experience, the Hungarian literary critic Georg Lukács more somberly traced its degenerative descent from classical epic. Describing the novel in gloomy and decidedly melodramatic terms as the epic of a world “abandoned by God” and as a record of modern humanity’s homelessness in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 (1920), Lukács looked back to the immediacy and communal integrity of ancient epic and saw the novel as the expression of what he called a dissonance in modern life whereby individuals are estranged from the external world. The novel records, he said, a profound irony at the heart of modern experience “within which things appear as isolated and yet connected, as full of value and yet totally devoid of it, as abstract fragments and as concrete autonomous life, as flowering and as decaying, as the infliction of suffering and as suffering itself.” During the 1920s Lawrence saw the novel as the unique record of concrete and living experience, whereas for Lukács, writing in Central Europe during the bitter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 it was symptomatic of the ironic and contradictory confusion peculiar to modern life in the West.

Whether taken as a rapturous affirm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individual fulfillment or as a depressing rendition of modern emptiness and alienation, the novel has invariably been understood by critics and novelists alike as the distinctively modern literary form, a response to uniquely modern conditions. Lawrence and Lukács agreed that modern life was deeply unsatisfactory, but they had opposite notions of what the novel could do to ameliorate it. For Lawrence the novel could transfigure and vivify life; for Lukács the novel eloquently but helplessly recorded its despair and emptiness. A third and to my mind more relevant attitude regarding the purpose of the novel, and one that takes a broader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perspective, has since emerged for modern criticism. For M. M. Bakhtin, a Russian critic whose neglected writings from the Stalinist period were rediscovered by Western readers in the 1970s, the novel was not only the unique marker of European modernity but a literary mode that expressed, in its essential and defining formal qualities, revolutionary and, potentially, utterly liberating linguistic energies.

According to Bakhtin, the novel represented an absolute and thus exhilarating breakthrough from older literary forms and from the hierarchical and repressive view of life he felt they embodied. In one of his essays Bakhtin distinguished the novel as being radically distinct from other literary genres in its rendering of a new "multi-linguaged consciousness," which made contact as literature never had before with "the present (with contemporary reality) in all its openendedness." The epic offers the world as a finished and frozen entity, an event from the distant past evoked in a special, specifically literary language appropriate to its inspiring grandeur and remoteness. But the novel, in Bakhtin's most influential formulation of his thesis, is defined by its rendering of the dynamic present, not in a separate and unitary literary language, but in the competing and often comic discord of actual and multiple voices—what he termed polyglossia or heteroglossia—whereby language is used in ways that communicate a "relativizing of linguistic consciousness." Speech in the novel, whether that of characters or narrators or authors, is thus always for Bakhtin "dialogical," representing the process of shifting and contested signification peculiar to language itself, or at least to modern notions of the way language works. The novel is dialogical in Bakhtin's special sense because it renders the incessant shap-

ing of reality as perceived by human beings through rival forms of language, which itself is not a static or ahistorical entity but rather finds dynamic and diverse embodiment in the competing dialects of particular social groups that struggle for dominance. In its evocation of the novel's subversion of static and hierarchical notions of language and reality, Bakhtin's version of the novel's positive and liberating func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seems to me more convincing, or at least more useful, than Lawrence's utopian intensity or Lukács's post-Great War gloom. Bakhtin's theory shifts the critical emphasis from the novel's subject matter, the nature of modern life and consciousness, to its form, the expressive relativizing of language. For readers of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it is interesting that Bakhtin singles out the British comic novelists, notably Fielding, Smollett, Sterne, and Dickens, for their instinctive grasp of the dialogical principle. When they described the purpose of the novel, Lukács and Lawrence were thinking primarily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novel of personal development, the bildungsroman, but Bakhtin took an inclusive historical view that looked back as far as François Rabelais's *Gargantua and Pantagruel* (1532–1552) and traced the novel's evolution through the lat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nd into the modern period. In thus broadening the novel's scope and historical reference in order to explain its peculiar power, Bakhtin saved readers from modern self-pity and enabled critics and literary historians to look beyond the modern predicament as the novel's only subject.

Nonetheless, the issue of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the novel from our present situation remains unresolved for many readers and critics. Clearly, the novel has become in the last three hundred years many different things for many readers as well as for novelists themselves. But for all that, the term itself remains both simple and elusive. So various and so multiple, the novel can be described but never, it seems, adequately defined. A minimalist description of the novel might say that it is an extended (too long to read at one sitting) narrative in prose about imaginary but vividly particularized or historically specific individuals. But however one describes it, the novel has been from its beginnings (themselves a subject of much dispute) for its writers and readers an aggressively and self-consciously new literary category. For many twentieth-century critics and historians of the novel, it is the narrative form that uniquely expresses the condition of Western culture and consciousness since the emergence of what everyone recognizes as the

modern age—an age in which we still live and that lacks clear definition or any sense of single or simple self-consciousness but that nonetheless situates itself, like the novel, as somehow separate and distinct from all that has preceded it.

Crucial to the culture of the modern age is individualism,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that the Western European tradition takes for granted as part of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but that in fact represents the fairly recen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 consciousness or sense of self that remains strange and even incomprehensible to people outside that tradition. Novels both promote and mimic the values intrinsic to this individualism. In most novels that come to mind, particular persons in their individualized immediacy are presented as being more important or more immediate than communities or cultures with their long traditions and accumulated ways, and the novel is most often about the clash between such individuals and the larger social units that necessarily produce them. The novel presupposes that clash, even if it often records an eventual reconciliation or reintegration of the individual with the surrounding society. The novel thus implies, as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 Edward Said has remarked, a universe that is necessarily unresolved or incomplete, a universe in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evolving or progressing toward a more nearly complete or more complex form of consciousness as it records the multiplicity and infinite diversity of individuals. Such a view is distinctively Western or Judeo-Christian, since, as Said points out, there are no novels in Islamic culture until it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modern West. For Islam, the world is complete, created by God as a plenum, full of every conceivable entity such a world could have. But for the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the fallen and sinful world (along with the individuals who compose it) is radically incomplete and yearning, in a religious sense, for individual salvation and for the transfiguring judgment day when human history shall end. In the thoroughly secular and psychologized context of the novel, this world is viewed rather more optimistically and is conceived as a process of progressive human development, reaching for higher or more complex forms of development for individuals and for their communities, for personal fulfillment and social utopia. In other words, the novel articulates the central, self-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religious and secular culture. If approached analytically and critically, say its defenders, it provides an unparalleled opportunity for self-knowledge for those within that tra-